

DOI:10.14137/j.cnki.issn1003-5281.2025.02.006

换一个角度看“何为中国”： 从“大一统”观到“国家—民族”理论

张继焦¹，刘云广^{2,3}

(1.中国社会科学院 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北京 100081；

2.中国人民大学 社会学院，北京 100872；

3.内蒙古党校(行政学院) 民族理论与政策教研部，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70)

[摘要]随着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不断深入，中华民族对主体性的自觉在“何为中国”的提问中得到重申。比照西方现代政治的国家叙事，当代中国对国家性的表述实现了知识逻辑的根本性转换，即从基于实体政治民族的“民族—国家”到立足于一体性历史过程的“大一统”。作为共同体的本质内核，传统中国在现代中国的国家建构中的意义进一步凸显。中国共产党坚持共同体政治理念，以彻底的革命战胜了政治和社会的双重危机，取得了国家建设与民族建设的双重成就。“大一统”凭借悠久的历史成为“中国性”的支撑性概念。然而在政治传播与话语辩驳的意义上，面对“民族—国家”的现代知识传统，“大一统”仍然无法精准表述、精确传达其作为独特现代政治过程的中国政治的发展逻辑。应以“国家—民族”理论表述“大一统”观，将“大一统”用于指称现代中国政治和社会的整体形态，并在历史和理论上论证这一概念的转化过程。

[关键词]大一统；国家—民族；何为中国；中华民族共同体

[中图分类号]B03；C95；D6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281(2025)02-0037-08

政治实践的兴起往往会引发人们对新话语体系的诉求，推动知识生产逻辑的转换。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投射到知识领域的首要成果便是对这一成功实践的理论阐释。在经验层面，一些西方学者习惯于将“中国”作为支持、佐证既有观念的偶发现象，并对其进行模式套嵌、病例分析和话语搬运^[1]，这实际上压缩了“中国”成为独立性理论议题的可能深度。

本文以“何为中国”为题，以知识生产、话语生

成为理论起点，深入探讨中国历史蕴含的“中国性”，努力发掘其中具有深厚底蕴、独特经验的现代性内容，系统分析、全面考察其理论化表述的适当性，具体包含三个子问题，即关于“中国性”的知识表述包含哪些基本要素？作为中国一体性叙述的核心概念，“大一统”经历了怎样的逻辑演进，其指涉的现代性内涵又是什么？在政治传播与话语辩驳的意义上，将“大一统”作为现代中国的主体性表述是否恰当？

[基金项目]全国党校(行政学院)系统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社科规划专项课题“全过程人民民主视域中的边疆治理研究”；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基金会资助项目、内蒙古党校(行政学院)科研课题“大一统国家韧性的形塑机制研究”；内蒙古党校(行政学院)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项目。

[收稿日期]2024-10-16

[作者简介]张继焦，男，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二级研究员，研究室主任；

刘云广，男，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院博士研究生，内蒙古党校(行政学院)民族理论与政策教研部讲师，本文通讯作者。

一、“何为中国”：“中国性”的历史出场与理论定位

以“中国”为主题的知识体系在逻辑上诉诸于对“中国性”的内涵阐释,在方法上指向于对中国长程历史的总体考察,即发掘现代中国的“历史规定性”。

(一)现代中国形成的历史情境及其内生经验

清朝末期,被动开启的现代化进程使中国陷入到文化失语、民族危亡的劫难当中。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实质上的国家转型以“共产主义救国”为突破口,通过思想和组织手段重塑能够支撑国家和民族的政治实体,这一过程所依靠的无疑是中国深厚的历史与文化底蕴。这一时期,“保全中国”是中国国家转型的核心使命和首要任务^{[2](P.153)},这要求现代中国的生成以自身的一体性为前提。作为现代国家转型的独特经验,上述历史过程成为支持现代中国国家理论的事实依据,其中蕴含的“中国性”既是“何为中国”的知识表征,又是近代中国的历史性再现。辛亥革命后,中国结束了封建帝制,而中国作为共同体的政治性、社会性要素——统一的多民族社会结构得以存续,并在现代中国国家体制的再造中发挥了规范性作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现代转型拥有宏大的世界历史背景,与此同时,其内在实现逻辑并非基于外力,而是秉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生存、发展原则。这些原则作为“一项举世无比的遗产”指向中国现代转型的内生经验。^[3]

(二)“中国性”表述的理论契机与规范要件

“何为中国”的发问首先针对的便是“中国”议题在西方“民族—国家”理论体系中的“例外”情形。因此,“中国性”议题的展开应以“民族—国家”理论为参照,以“政治中国”为面向。作为具有现代意涵的学术概念,民族理论可按照理论立场分为本质主义、建构主义两类。斯大林的民族定义是本质主义的代表,即“民族”需要同时具备语言、地域、经济生活和心理素质四个标准。^{[4](P.32)} 19世纪,本质主义的民族设定是欧洲现代国家建构的理论依据。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对“民族”概念的讨论逐渐转向建构主义,这是西方理论界对第三世界民族解放运动的直接反映。在此情境下,民族被国家限定,民族事务被化约为国家政治现代化的转型成本,民族问题被归置为国家体制建设的副产品。然

而,基于发生学视角的国家生成理论并不能完整描述现代国家的全部形态。在理论层面,作为当代原生论的代表,安东尼·史密斯注意到“民族—国家”理论在逻辑上的根本缺陷,即“现代民族”与“前现代群体”并未根本断裂,历史仍然是民族的先决条件。^[5]在现实层面,中国的伟大实践为现代国家、现代社会的发展提供了非西方的成功经验。中国迈向现代政治的存在基础、发展逻辑具有历史、社会、文化的延续性,“是中国建构具有内在统一性的一体化现代国家的社会基础所在”^[6]。对自身现代政治经验和深厚历史文化传统的主体性解释是立足于本土构建话语体系的关键,是国家理论对经验世界保持开放性的基础。这为“中国性”的分析提供了贯通方法论、本体论和实践论的学理脉络。

二、“大一统”:中华民族的国家叙述

只有以“大一统”为中心的古代理想观念被当代知识界所接受,作为知识主体的“中国”才能被彻底激活,并在现代社会科学的语境中获得完整的诠释空间。笔者以“何为中国”为题,将“中国”置于古今中西的视野当中,尝试回答“中国由何处来”“中国以何处立”“中国向何处去”等关键问题,着力构建“以中国为对象”“以中国为方法”“以中国为立场”的致思经纬。

(一)“大一统”的意涵与逻辑

关于“大一统”的记载最早见于《春秋公羊传》。董仲舒在《天人三策》中完成了对“大一统”的话语建构,确立了传统语境下“大一统”的文本基础。在谱系学视角下,“大一统”可被解构为三个知识命题。

1. 夷夏之辨 立足于中国一统性视角,“中国性”在“大一统”层面的记述是通过夷、夏的对照与互认呈现的,这涉及“大一统”的第一个知识命题——“夷夏之辨”。首先,“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7](P.24)}。夷夏有别作为事实,是被承认的。其次,这一区分被转化为地理意义上的文明格局。“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州里”与“蛮貊”之对正是“中国”“夷狄”之别的后果。^{[7](P.162)} 夷夏有别并不意味着夷夏有分,夷夏的转化与融合始终是古代中国的重要现象。正所谓“孔子之作《春秋》也,诸侯用夷礼则夷之,夷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8](P.17)}。《明太宗实录》载:“(明成祖)人恒言,以不治治夷

狄。人性之善，蛮夷与中国无异。夫好善恶恶，人情所同，岂间于华夷。”

2.天下之说 《禹贡》记载的地理观是“天下”的最初含义，即“九州”与“五服”。前者以自然界限为分界描述自然环境的九大区域，后者以政治格局为分层，以王都为中心，向外渐次拓展形成等级化圈层。^{[9](P.78)}在《诗经》等经典文本中，“天下”也包含“中心”与“四方”相互比照的意义。“民亦劳止，汜可小康；惠此中国，以绥四方。”^{[10](PP.6~7)}“四方”即围拱中心之国的四方诸国，“中国”之“中”亦与“四方”并立。集“中国”“四方”于一身的“天下”正是守正向心之“合”。《大义觉迷录》载：“九州四海之广，中华处百分之一，其外东西南朔，同在天覆地载之中者，即是一理一气。”“天下”呈现出“理气相即”的“旋涡”样式。^{[11](PP.73~88)}

3.正统之学 “夷夏”与“天下”论说或偏重“话语”，或偏重“行动”，都是对传统中国政治社会实践中的某一面向的揭示。在传统中国的语境中，“大一统”强调的是“中国”作为完整范畴的复合意涵，这是“大一统”超越“夷夏”与“天下”论说的关键所在。在此，“大一统”既可被视为中国的身份界说，亦可发展为由自然地理格局衍生而来的关于王朝更迭的秩序想象，进而凝结为一种正统性叙事原理。“元者，始也，言本正也。道，王道也。王者，人之始也”，“春者，天之所为也；正者，王之所为也”。^[12]“元年春”表明国家政治的合法性建立在超越形而上的价值之上，“王正月”表明世间秩序必然在历史化中彰显为特定的政治形态——“王政”。^{[13](P.223)}因此，所“尊”之“王者”必然是“正者，正也。统致其气，万物皆应而正。统正，其余皆正。凡岁之要，在正月也”（《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质文》）。“王”是宇宙秩序与政治秩序的枢纽，是道德与经验的集合。可以说正统论是围绕“王”建立起来的，由正统论拓展出的“大一统”具备“道统”与“政统”的双重向度。

(二)作为现代知识资源的“大一统”

夷夏之转化造就了“大一统”在共同体成员组成上的结构之“大”，“天下”之一体则成就了“大一统”在价值次序上的范围之“统”，“大”与“统”的内在同构决定了“大一统”在经验与精神上的统一必然凝结为“正统”之“一”。“定于一”的现实制度形态在“周秦之变”中构建完成，展现出“秦制”作为古代中国政治和文化建制之基始的决定性意义。“夫一统之事，始于秦，而从空间以言‘天下一统’之称，恐亦导源于此。”^{[14](P.4)}《春秋》所以大一统者，六合

同风，九州共贯也。解构“大一统”，其中蕴含识别“中国性”的三个知识坐标。

1.作为话语—实践策略的治理体系 “大一统”既是道德也是秩序，即作为“统治思想和治理实践相结合的古代政治文化现象”具有双重意涵。^[15]从历史演变看，“大一统”的萌芽产生于西周，其制度形态发端于秦汉，极盛于清朝。及至近代，“大一统”的深层结构在社会转型中得以延续和发展，成为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力量源头。数千年来，思想意识与政治建制始终相伴而生，以“尊王”为核心构建起的“正统论”将“大一统”的双重向度集于一身，使“道统”与“政统”既相互证成，又互为表里。不同于西欧民族国家对政治结构的设计，“大一统”的规范性约束直接由现实政治过程给出，涉及的一系列治理事务和社会变革，是思想追求和政治策略高度耦合的“礼序化”制度体系。^[16]共同体在“定于一”的前提下实现了“以上正下”与“以上治下”的结合，“大一统”展现出“中国性”突出的治理倾向。

2.作为王朝正统性的系统建制 从本质上看，“大一统”体现了国家整合意义上的政治集中。与道德秩序、政治秩序密切相关的“合法性政治”以及“政治合法性”均离不开“王”，前者体现为“王”赢得“天命”，后者体现为“王”施行“王道”。“王”居于天人之际，贯通古今之变。宇宙的道德性与政治的历史性以“王”为衔接点相互贯通，最终“尊于王”而“定于一”的“正统”生生不息、循环往复。“正统”乃“大一统”的别称。^①作为道德秩序与政治秩序的统一，“大一统”通过“尊王”逻辑的转化获得最广泛的历史与现实意义。“大一统”既可用于表述王朝国家在其广大疆域内得到民众支持的集中化政治秩序，又可用作指称王朝更替之际绵延不断的一体化“中国”的历史秩序。

在现代政治语境中，国家就是延续“大一统”内在逻辑的现实形式，只不过立足于“中国性”的“国家”不是奠基于西方经验的民族国家，而是具有深厚历史底蕴、德性精神的政治文化系统，比任何单纯的政治组织形式更复杂、更深刻。因此，中国的现代国家建构不仅是现代国家形态学意义上的国家建构，还是“大一统”国家和政治“大一统”的双重现代转型，涉及对共同体延续的事实性辩护和必要

^① “大一统”强调的是超越朝代的一统性，“正统论”更为强调某一王朝在王朝更替中的正当性，两者存在细微的差别。参见饶宗颐《中国史上之正统论》，中华书局，2015年。

性论证。

3.作为历史写作的意识形态范型 “正统论”使“大一统”从构想变为事实。作为“大一统”在历史经验上的呈现,“正统化”历史使“大一统”在经验事实层面得到解释和规范。在这个意义上,作为王朝之变、古今之常的“大一统”必然与王朝政治紧密联系在一起,成为辩证统一的整体,为有效回应经验主义对“大一统”的解构提供了重要的学理支撑。经验主义史学运用人类学、民族学的研究方法,转换包括边疆史在内的学术议题,寻求“大一统”中国的“例外”情形,试图以“时空之断裂”否定“中国”的内在一体性。本文以“正统论”对“大一统”进行逻辑阐释的过程恰是对上述知识企图的严正反驳。^①

“大一统”通过“正统论”将宇宙与政治衔接于“王”,王者统“天、地、人”成“大一统”。天命以王而正,万民以正而王。前者代表以王权为核心的古代中国的政治社会结构,后者表明作为历史书写方式的“大一统”本身就是政治力量延伸的经验图式。二者在“大一统”框架下实现了知识与权力在特定历史时期内的转化与汇通。历史上,皇权与士大夫

在以儒家为核心的意识形态基础上结成联盟,这使得以政治集中为核心的“大一统”始终保持着对话语和行动的“中央调控”——以权力系统为社会结构框架,在行动上以政治支配为社会运行模式,在话语上以思想文化论证这一政治过程。因此,“中国”之“中”不仅是地缘之中,毋宁说“帝王所都曰中,故曰中国”^{[17](P.114)}。“大一统”在现实形态上更加完整。

(三)“大一统”的适用性及其限度

上文对“大一统”的阐释充分表明,“大一统”同时蕴含道统、正统、学统三个维度。^②笔者认为可以用“大”“一”“统”三字分别对应上述三维,即至“大”无外的宇宙观和天下观、合乎“一”者的政治观和社会观、正而“统”之的历史观和文化观。在“大一统”的“中国性”叙述中,以“圣”为“正”回应了纵向的朝代更替之异,以“礼仪”为轴心的“道德天下”之道统从而产生;以“王”为“统”回应了横向的夷夏共聚之同,以“地理”为界分的“中华国家”之政统从而形成。“道统”与“学统”共同作为中华文明的内在精神,积淀于“学统”之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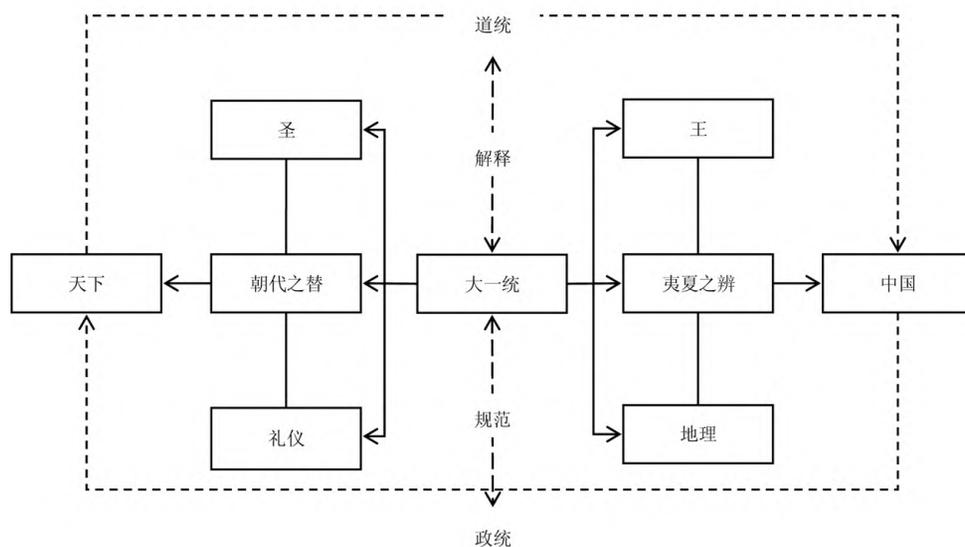


图1 “大一统”的“中国性”表述

① 关于经验主义对中国“大一统”叙事的冲击,可见边疆史、内亚史、“新清史”以及深受后现代思想方法影响的民族学、人类学的研究成果,尽管相关研究的着力点各异,但均以突破传统中国一体性为逻辑要点。笔者认为,王朝更替之变异与中华一统之赓续并无相悖之处,正是王朝之变使中国一体之统续得以传承,在共同体意义上最大程度地实现了政治集中、维持了一体性内核。相关研究可参见拉铁摩尔《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杉山正明《疾驰的草原征服者:辽、西夏、金、元》,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施坚雅《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中华书局,2000年。

② “道统”指“内圣”的文化和精神统续,“政统”指“外王”的具体政治形态演进,“学统”指学术传统。参见牟宗三《道德的理想主义》,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5年;牟宗三《心体与性体》,联经出版公司,2003年。

1. 政治形式与政治内容一体 “大一统”表明“道之统”与“政之统”是相辅相成的,即作为政治形式的“天下一统”与作为政治内容的“夷夏一体”是互为表里的。没有国家形式的“道德天下”就无法容纳民族内容的“一体中国”,而要做到“一体中国”就必须共守“道德天下”。历史上,“大一统”是中华民族的共同理念。中华民族采用并推行共同的文化政策的重要原因在于,国家与民族在“大一统”中是一体的。不同于西方民族国家的政治观念,中国将民族观念经由“大一统”的文化意识、政治行动自然地融聚于普遍性的共同体观念之中。可以说,中国人民始终如一的认同是全国各族人民对“大一统”中国的深切认同。

2. 政治过程与政治结果统一 经验表明,作为共同体的政治屋顶,传统中国并不是现代组织形式意义上的“国家”,而是“天下”以及由此确认的“中国”。这意味着,个人在逻辑上不与国家相互证成,共同体之国家性不需要诉诸于个体层面的论证,个体的生存也不依赖于作为具体政治主体的国家确认。家国一体的背后是个体生存、家庭发展与国家运行在逻辑上的同时性,是一种“在场”的共同体形态。传统中国的经验表明,个体与集体在源初就是被共同建立起来的。上至“天子”下至百姓,都要面对共同的“天”与“道”,而“天”与“道”并未被实体化、肉身化为神权政治,因此蕴含现代政治的维度。“天”与“道”凭借自身深远的道德旨归、人性关怀显映于人间。道德与政治实现了循环,推动作为共同体的中国在历史实践中追求道德、关照现实(民本政治伦理)。在此过程中,政治过程与政治结果并未被程序性地隔绝开来,而是在“大一统”的历史情境中共同维系一体化过程、分享一体化成果。“团结”的意识沉淀于中华民族的文化自觉中,成为“中国性”的根本意涵。

3. 政治实践与政治策略统一 持续巩固统一的多民族共同体是中国现代转型的重要原则。从整体上考察中国近代史,无论是改良还是革命,均以塑造和巩固作为共同体的国家和社会的整体力量为终极目标。在这个意义上,现代中国并非照搬西方民族国家的技术规划来建构国家,而是着力将自身建构为东方摹本,毋宁说是延续传统中国的深厚历史资源和文化精神,在现代政治的发展过程中创造性演进“大一统国家”。历史表明,中国的国家建构与其说是国家政治形式的变化,不如说是整个社会最深刻的变革。与此同时,社会革命也是“塑

造人民”进而建构国家的历史过程:国家政治最终落实为巩固和发展国家一体性的方略,国家与最广大人民为谋求中华民族生存和振兴共同推进政治社会建构的过程。

综上所述,“大一统”为“中国性”的表述开辟了整体视野。但是,以现代社会科学理论形态的一般意义衡量,“大一统”对于传统中国建制性要素的刻画并不清晰,对于具体社会过程中各主体间的权力关系的揭示仍显模糊。例如,传统中国作为政治实体以何种方式形成并巩固自身的共同体凝聚力?这一方式实现了怎样的整体功能?其中蕴含着哪些独特的社会关系?要解答上述问题,还需要透过“大一统”的宏观描述,进一步考察“大一统国家”外化的具体制度和组织形态,提高人们对于经验性要素的认识精度,推动“大一统”的话语更新。

三、国家—民族:“大一统”中国的现代重述

作为现实与理论的纽带、社会科学研究的基石,“概念”总是建构于一定的“情境—价值”之上。^[18]鉴于此,构建中国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必须从构建符合中国“情境—价值”的概念体系出发。

(一)“大一统”的制度和组织基础

“天下观”随着秦制的建立得以实体化,形成了与“大一统”体制相适应的制度化表达。^{[19](P.80)}历朝历代在建立政权时都十分注重制度体系的建设,并以此来维护共同体。制度和组织的形态是“政治中国”的外化,制度和组织的作用过程是“文化中国”的内化,二者的双向运动共同构成“大一统”国家的生动实践。在社会科学视野,以制度和组织充实“大一统”的“情境”经验是判断“大一统”作为“中国性”表述是否有效的基础。笔者认为,可以从“结构—功能”视角出发,将贯穿“大一统”的制度和组织丛集拆分为三个子集,即“官僚制”的组织制度、“兵刑合一”的国家功能以及二者共同组成的“家国同构”的政治形态。

1. “家国同构”的政治形态 在论证和阐释“大一统”国家的政治形态时,许多学者从《大学》中的“修齐治平”论述出发提出了“家国同构”理论,并以此阐释“大一统”的伦理价值。然而,作为现实中的社会结构,“家国同构”具有深刻的制度面向。“家庭”与“国家”构成了传统中国政治秩序的两大基础性结构,不论是关于社会角色类型的“八政”说,还是关于“父子君臣”的“两政”说,都旨在通过协调基

本人际关系来实现共同体的良性运行。所谓“顺言曰政，顺政曰遂”（《逸周书·常训》），无论是基于血缘、宗法的家庭秩序，还是建立在等级化权力上的国家秩序，都被吸纳到共同体政治生活的范畴之中。“大一统”以“家国同构”为中心延伸出“官僚制”结构和“兵刑合一”功能。

2.“官僚制”组织制度 与“家国同构”直接对应的组织制度是联结国家与社会、中央与地方、官员与百姓的纽带——官僚制。从共同体的形成看，来自于外部的竞争压力是形塑官僚制的重要力量，“得益于官僚制富于理性色彩的科层结构，共同体的凝聚力得到强化”^{[20](PP.165~166)}。从共同体的运行看，官僚制具有平衡利益结构的制度功能^[21]，蕴含着集中化控制机制^{[22](P.91)}，与共同体、皇权紧密相关。类似于政治与社会在“正统论”下的深度结合，皇权本身具有凝聚共同体的社会功能，因此弗朗西斯·福山关注到（秦代）中国创造了韦伯理论中的现代国家，即中国成功地发展出了一个中央集权的、统一的官僚政府且早已具备了现代政治的某种精神和制度要素。^{[23](P.121)}

3.“兵刑合一”的国家功能 “兵刑合一”又称“刑起于兵”，最初是关于中国古代法律起源的学说，认为部落之间的军事征战是法律形成的动力。“刑，罚罪也，从井从刀。《易》曰：井，法也。”“械者，器之总名”，“用器之人亦曰兵”。^{[24](P.104)} 作为“大一统”中国建构和强化自身的重要举措，“兵刑合一”在政治和社会的运行中逐渐演化为“兵刑同制”的整体形式。“刑”即法律上的规制，“兵”即政治武力统合，对外为“兵事”，对内为“刑罚”，是一体两面的。“兵与刑乃一事之内异用，其为暴力则同……兵之与刑，二而一也。”^{[25](PP.535~536)} 二者均为基于国家立场、以国家之名义、以维护国家为目的的强制性举措。“刑罚不可捐于国，诛伐不可偃于天下”。毋宁说“兵”“刑”之分实际上展现出“大一统”的一体性，即“大一统”以“天下”与“国”的双重属性为基础进行的制度性分化。由广义上的“刑”“法”“律”构成的国家主义制度体系将政治运行的程序系统与法律制度的规范功能有机结合，在法律和军事上运用强制力表达共同体意志，完成巩固中央权威、稳定社会秩序、维护国家统一的国家功能。

（二）“大一统”的政治取向

“家国同构”不仅是共同体建立和恢复的策略工具，也是共同体巩固和发展的逻辑起点，以丰富的制度表达与组织实践维护共同体统一的“政治统

合机制”。^[26] 古代中国处于东方文明源头的轴心，孕育出独特的政治结构和社会形态。不同于西方“以财产和地域因素消解部落组织”形成的古典国家，中国在部落瓦解后“以血缘宗法因素”重新聚合起大型宗法乡土共同体，从而迈入文明。中国“一统”的“王政”在周秦之际业已成为主流，之后逐步得到制度化巩固并成为中国社会最根本的结构要素。正是因为中国的政治过程奠基于深厚的社会文化土壤，中国微观的社会单位（家）、群体的思想信仰（儒家）、宏观的国家结构（大一统）均以共同体的权力集中为核心，并最终以“礼治”形成“治理型秩序”运行的闭环。^[27]

（三）“国家—民族”理论：以国家主义为内核的话语转换

中华文明在发轫之始就以其包容共聚的精神追求明显区别于西方，从维系国家的内在统一、推动国家的整体发展出发，开启了自身的实践创造。不论是历经五千年沉积的文化基因，还是近代以来救亡图存的曲折斗争，中国的一体性凭借自身的集中化逻辑得到了传承和发展。作为相对独立的政治社会体系，传统中国的集中性在“大一统”的丰富内涵中得到充分展现。作为中华民族存续的根本逻辑，“大一统”包含的“多民族共同体的发展形态、‘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的文化形态、‘民为邦本，天下为公’的价值形态、‘礼乐征伐’自中央出的国家统一形态”没有改变^[28]，且业已发展成为现代国家建构的内在要求，深刻规定着现代中国的发展逻辑。这一恒常性因素构成了对现代中国一体性表述的逻辑脉络。

作为“中国的国家主义”，历史中国的“大一统”已发展成为以现代国家政治为核心结构特征的新的共同体形态。在与西方现代国家理论进行比较的过程中，笔者提倡以“国家—民族”理论补充“大一统”，并以此表述中国作为共同体的内在经验，即中国的国家建构基于“国家—民族”理论，其核心政治逻辑是延续自身的“大一统”，现代中国的民族事务和社会各项事业均以国家的第一性来规划和设置。不同于西方“先建民族再设国家”的政治建构路径，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以共同体形式自在的，因此就中国而言，群体收摄个体的“层级关系”是最重要的关系。西方的现代化意味着共同体的断裂与重构，需要在政治主体的对峙与轮替中推动政治过程，而中国的现代转型则是自在的共同体向自觉、自强的共同体发展的过程，其成功与否的关键在于

能否建立起有效推动自身一体化的核心。相较于西方的“国家”概念,中国的“国家”概念具有更丰富的内涵。西方的“国家”只是市场逻辑排异后需要限定和规范的政治组织形式,在此“国家”是被发明的制度化工具;中国的“国家”是共同体的体制样态,具有政治和文化的多重意蕴,由此形成的是庇护主义的国家观念和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

在对话意义上,将“国家—民族”理论作为中国一体性的知识表述具有三大优势。一是从“国家”概念出发建构自身话语可以有效表述中国独特的政党政治经验。中国的政治现代化历程既拓展了后发国家现代化的道路选择,又丰富了政党类型学,二者共同构成了中国特色党政复合体制的线索。中国是党建国家,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使命型政党。无论是国家建构还是政党建设,中国的经验都是独特的,当代中国与历史中国深刻的文明性关联使中国的一体性得到进一步发展。二是以“国家”第一性来表述自身经验可以廓清中国现代政治的本质。作为文明主体在大历史观中的自我认知,中国的现代性政治议程只能“以中国为方法”“以中国为立场”。因此,中国的独特经验始终处于现代国家的政治图谱之中,并持续扩充着现代政治的知识版图。“国家”的第一性无疑与中国的内在经验相耦合,与现代政治的民主价值深度契合。三是以“国家”诠释中国的政治底色可以有力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中国共产党通过彻底的社会革命将广大民众凝聚为推动中国现代国家建构最根本的力量——人民。通过人民与革命的相互塑造,中国内在的共同体力量被唤醒,中国成为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核心的政治实体。因此,以人民为共同体内核建立起来的现代国家只能是人民掌握政权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集中中华民族建设与中国现代国家建设于一体”^[29],其中的知识逻辑来源于民族建设,但对民族的整体性、政治性的确认来自于国家,即归根结底是由国家建设所引领和统摄的。中国的民族建设始终是中华民族的大民族建设,国家的政治意图是共同体的公共意志,最终指向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结语

“中国性”需要在“历史中国”中追溯。作为共同体,中国具有“政治中国”与“文化中国”的双重面

向,二者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逐渐重叠。在对中国进行历史化读解的过程中,“历史中国”得以焕发出现代的生机,而现代中国的转型实践则为重新理解和阐释中国历史提供了重要契机。要对“中国性”展开知识考察,就必须在现代性的普遍要求与中国自身的内在特质之间寻求平衡。“大一统”是“历史中国”深层次的内生禀赋,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提供了有力支撑。正是基于共同体的价值和经验规定,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即便历经“变”与“异”,却始终延续“恒”与“常”。“大一统”国家政治奠基于多民族一体的社会基础,表明中华民族对伟大祖国的深切认同,反映出中国历史一体性、中国文化主体性的本质所在,体现了政治与民族相互塑造的内在逻辑。从这个意义出发,以深厚的历史经验为基石,秉持“往昔得法,未来循迹”理念生成的“国家—民族”理论正是在现代知识语境下辨识与诠释“中国性”的有效范式。

[参考文献]

- [1]景跃进.中国政治学的转型:分化与定位[J].政治学研究,2019,(2).
- [2]萧公权.近代中国与世界:康有为变法与大同思想研究[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21.
- [3]杨光斌.政治学方法论与历史观问题[J].政治学研究,2023,(5).
- [4]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民族理论室.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民族问题文选(斯大林卷)[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
- [5]安东尼·史密斯.民族主义:理论,意识形态,历史[M].叶江,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
- [6]林尚立.大一统与共和:中国现代政治的缘起[J].复旦政治学评论,2016,(1).
- [7]论语译注[Z].杨伯峻,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80.
- [8]韩昌黎文集校注·原道[Z].马其昶,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 [9]周振鹤.中国历史政治地理十六讲[M].北京:中华书局,2013.
- [10]杨向奎.大一统与儒家思想[M].北京:北京出版集团,北京出版社,2016.
- [11]赵汀阳.天下的当代性:世界秩序的实践与想象[M].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6.
- [12]王银宏.“兵刑合一”:中国古代“大一统”观念的国家主义表达[J].社会科学,2022,(8).
- [13]蒋庆.公羊学引论:儒家的政治智慧与历史信仰[M].福州:海峡出版发行集团,福建教育出版社,2014.
- [14]饶宗颐.中国史学上之正统论[M].上海:上海远东出版

- 社,1996.
- [15]杨念群.“大一统”与“中国”“天下”观比较论纲[J].史学理论研究,2021,(2).
- [16]李宸,方雷.礼序政治:“大一统”叙事的回归与重构[J].开放时代,2021,(2).
- [17]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M].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
- [18]郭忠华.中国社会科学概念建构的基本策略——基于情境—价值的视角[J].江海学刊,2023,(5).
- [19]渡边信一郎.中国古代的王权与天下秩序:从日中比较史的视角出发[M].徐冲,译.北京:中华书局,2008.
- [20]Zhao,D.The Confucian Legalist State: A New Theory of Chinese History [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5.
- [21]蒙克,曾极麟.天命观下中国早期家产官僚制的形成[J].社会学研究,2022,(5).
- [22]马克斯·韦伯.中国的宗教:儒教与道教[M].康乐,简惠美,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 [23]弗朗西斯·福山.政治秩序的起源:从前人类时代到法国大革命[M].毛俊杰,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
- [24]说文解字注[Z].许慎,撰.段玉裁,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 [25]钱锺书.管锥编[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
- [26]任锋.大一统与政治秩序的基源性问题:钱穆历史思维的理论启示[J].人文杂志,2021,(8).
- [27]朱承.中国哲学的普遍性探寻与共同体意识[J].中国社会科学,2023,(10).
- [28]陈明明.中国政府原理的集权之维:历史与现代化[J].公共管理与政策评论,2021,(1).
- [29]严庆.多民族国家建设的话语与方略——基于国家建设与民族建设关系的视角[J].民族研究,2022,(4).

(责任编辑 曲锋)

Rethinking What is China from a Different Perspective: From the Great Unification View to the State—nation Theory

ZHANG Ji—jiao, LIU Yun—guang

(*Institute of Ethnology and Anthrop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081, China; School of Social Research,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China; Teaching and Research Department of Ethnic Theory and Policy, Party School of Inner Mongolia, Hohhot Inner Mongolia 010070,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deepening of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 the Chinese national consciousness of subjectivity is reiterated in the question of what is China. Compared with the national narrative of modern Western politics, contemporary China has achieved a fundamental shift in the logic of knowledge in its expression of national identity, from the nation—state based on physical political ethnicity to the great unification based on an integrated historical process. As the essential core of the community, the significance of traditional China in the national construction of modern China is further highlighted. Adhering to the concept of community politics, the CPC overcame the dual crisis of politics and society with a thorough revolution, and achieved dual achievements in state construction and national construction. The concept of great unification has become a supportive concept of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with its long history. However, in terms of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and discourse refutation, facing the modern knowledge tradition of nation—state, great unification still cannot accurately express and convey the development logic of Chinese politics as a unique modern political process. Using the theory of state—nation to express the concept of great unification, using great unification to refer to the overall form of modern Chinese politics and society, and demonstrating the transformation process of this concept in history and theory.

[Key words] Great Unification; State—nation; What is China; 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

学人风采



张继焦，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二级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博士生导师。系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侨联常委、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中央统战部党外知识分子建言献策专家组成员、中国民族学学会法人代表兼副会长。曾任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副理事长、加拿大多伦多大学访问学者、日本国立民族学博物馆国际研究员、马来西亚马来亚大学国际研究员等。主要研究领域为企业人类学、都市人类学、生态环境研究。出版中文专著《价值链管理：优化业务流程、提升企业综合竞争能力》《控制链管理：防范客户和应收账款风险》《市场化中的非正式制度》《老字号企业发展报告（2023~2024）》《当今国际人类学》等 26 部、英文论著 4 部，发表中文学术论文三百余篇、英文学术论文三十余篇。学术成果被翻译成英语、日语、法语、德语、西班牙语等 5 种语言文字出版。提出的“二元社会结构论”（伞式社会、蜂窝式社会）、新古典“结构—功能论”、“国家—民族”理论等产生了较大的社会影响。

吴楚克，内蒙古医科大学特聘教授，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法学博士。系哈萨克斯坦欧亚大学特聘教授、美国俄勒冈大学访问学者、中国台湾中正大学访问学者。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中国边疆学原理研究”、教育部重大课题攻关项目“跨界民族与中国地缘安全研究”等。出版专著《民族主义幽灵与苏联裂变》《中国边疆政治学》《文明与跨文化新论》《西去丝路第一国：哈国纪事》，主编《中国蒙古族朝鲜族民族发展与认同研究》《东蒙史述与周边关系》《额济纳与额尔古纳社会发展比较研究》《中国边疆学理论创新与发展报告（2013、2015、2016、2018）》，在《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思想战线》等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中国疆域问题与中国边疆学理论建设之关系》《试论中国边疆政治学与边政学、民族学的关系》《跨界民族认同意识的“心理适应度”》《从社会分工角度研究中国民族问题》《21 世纪以来国外中国边疆研究重要文本分析》《现时代理性认识的特点与中国边疆学建构》《解构边疆观与重构边疆学》《中国边疆学的新时代特征与知识原理》等。



张澍军，东北师范大学思想理论教育研究所所长，东北师范大学荣誉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央“马工程”专家，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兼任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学部委员、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人文教育专业委员会理事长等。曾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教育部政治学教指委委员、教育部高校思政课教指委委员、全国高校思研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东北师范大学党委宣传部部长等。主要从事思想政治教育基础理论与高校德育、马克思主义理论及教育研究，开创了德育哲学系统研究，在思想政治教育基础理论研究领域建树颇丰。主持国家级、省部级项目 18 项；出版著作 16 部，主编出版“德育哲学研究丛书”“思想政治教育前沿问题研究系列著作” 19 部；发表学术论文三百二十余篇。获得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 4 次（其中二等奖 2 次）、吉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10 次（其中一等奖 3 次），以及全国优秀教师、全国普通高校党的建设和思想政治教育先进工作者、宝钢教育奖·优秀教师等荣誉称号。

本刊不以任何形式收取版面费
 全国社科工作办举报电话：010-63098272